



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

为了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促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久前共同举办“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学术话语的关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推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刊发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编者按

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施旭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涌现出一批优质的成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一些研究中存在西化倾向,自主性、民族性意识匮乏,公共性、实践性欠缺,解释力、传播力低下,更谈不上引领国际学界;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所形成的独特经验,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呼唤中国社会科学抓住机遇,拓展创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如何反思过去、向前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从“话语”视角理解中国社会科学

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目的、性质及状况,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我们可以从“话语”视角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发展的课题,尤其是建设好相应的“话语体系”。

“话语”是特定族群以语言使用为特征的社交实践,一般包括六个要素:对话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话语作为人类社交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更有文化性,即历史形成的“交际多样性”和“交际竞争性”。显然,社会科学是特定文化群体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列于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这些以学术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实践,同样离不开话语,包括的各个要素。根据上述对话语的认识,学术话语同样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竞争性:一是历史形成的不同族群的社会科学话语,虽然具有共性(如关心人、群体关系),但也体现个性(独有的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意识、方法论);二是不同族群的学术话语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如传统中国学术话语强调整体辩证,注重社会伦理,提倡学以致用;而西方学术话语依循二元对立,崇尚个人主

义,追求纯粹知识等。此外,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无论从话题、形式、媒介、模式,还是对世界的影响程度来看都是如此,表现出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中国学术话语总体上往往处于缺席、失声的状态。

话语能够维系、传承、奏效,取决于话语实践背后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由“物质性/硬性”的“交际体制”(如组织、机构、制度、平台、媒介)和“精神性/软性”的“交际原则”(如概念、范畴、理论、规则、策略)组成的综合系统。它支撑、形塑、影响话语实践的过程与结果,如同人的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规约行动;它是特定话语群体在特定社会领域为执行特定任务而具备的“话语能力”。学术话语失调、失灵、失语,或者相反能够成功描述、解释、阐明、评价、指导社会实践,并有效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声音,与其话语体系有密切关系。因此,提升、拓展、创新学术话语,应首先建设好学术话语体系。要建设好一个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除了要求清晰全面,还需要深刻把握自己特殊的使命、价值、目标、语境,特别是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唯其如此,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有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肩负着总结过去、启迪未来,辅助国家实现大战略,推动人类知识繁荣进步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思想水平和能力的代表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方面。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目的就是构筑一套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人类文明的完善的科学系统,使其能够准确阐释中国实践,有效指导中国发展,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秩序治理,从而推动人类知识繁荣创新。

为了实现话语体系的建设目标,首先,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语境层面需要一个公正的国际学术环境。然而,现实情况是西方学界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和判断标准,借助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使学术成为一种西方独白的霸权话语体系。相比而言,

中国社会科学话语权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尤其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国防等重要国家利益方面。其次,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精神层面或者说主观上,应达到“高尚而系统”的水平,这包括民族性、世界性、公共性、包容性、连贯性、继承性等。但在西化化等复杂因素影响下,我们的话语体系受到冲击,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所谓“去政治化”“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等倾向,另一方面是丧失人文性、抛弃公共责任,丢失学以致用的传统等。我们缺乏从本土经验生发的有效理论,导致在学术话语竞争中出现失语甚至学舌的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不仅危害学术安全,而且影响中国价值和中国人民精神的表达。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学术上缺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最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物质层面或者说客观上应具备“精良而稳固”的品质,这包括坚韧性、稳定性、顺畅性、平衡性、专业性、有效性等。

提升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

当前,我们面临着管理行政化,信息渠道存在瓶颈,学术评价机制不健全、不公正、不科学,考核量化、僵化,科研基金管理不科学、国际化传播平台建设滞后,出版能力过低、规模过小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就是影响了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加之在文章投稿、基金申报、成果评奖、职称晋升等过程中出现不良竞争,一些研究逐渐失去社会关怀,成果不注重现实转化,更产生不了社会影响力。为此,应采取全面、系统、“软”“硬”结合的方式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其质量和影响力。

第一,推动构建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学术环境。中国学界需主动地、全方位地向世界阐释中国学术优秀成果,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交流对话,揭露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展示多元对话的创新意义等,并更多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开展深度合作,以形塑一个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学术交流秩序和传播空间。为此,我们应建设系统、畅通、高效、牢固的媒介、平台、渠道、网络,以利于学术交流和传播以及成果的转化。知识的传播是学术发展和应用至关重要的方面,不仅决定其方向、

内容、质量、速度、效果,而且影响学界社会结构关系。因此,我们应坚持学术成果出版传播的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全球化,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加快转型升级。

第二,加强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和管理。国际经验证明,政府及其政策可以对社会科学进步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加强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支持力度,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创新事业,进一步疏通成果转化渠道,提高各基金成果质量。同时,建立公正、公平、科学的学术评价评审体系,完善相关评审、评价、监管机构和相关机制,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三,立足中国传统和当代现实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应坚持民族立场,弘扬民族精神,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胸怀、情感、境界融入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新理论、新主张、新方法的创造之中。同时,培育具有当代意识、主体意识、社会意识的研究者,使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在学术研究中建立中国视角,彰显中国问题,关注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和现实环境。因此,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突出社会价值、公共价值,探索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助力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如在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化解不同利益群体矛盾,摆脱能源、生态发展危机,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除了从民族文化、域外文化中汲取养分,还应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具体研究领域和研究过程中探索新方法,建立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模式。

构建完善的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将有力地提升中国学术水平及其国际地位,也必将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人类知识的繁荣。我们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不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升其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系教育部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院院长)

形成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国学术话语

◎赵光辉

和中国价值。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应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不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积极回应时代需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用中国精神滋养世界文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学术理应体现这个鲜明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中国学术话语的创新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和重大成就,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好地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术话语总结、概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体现民族性、继承性的学术话语

恩格斯曾说过,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以此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意味着我们首先应把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理解为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的学术话语创新过程。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应融通各种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学术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的深厚基础。只有建立在通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学术话语,才能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立足于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在创新中国学术话语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通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古为今用,通晓其他国家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洋为中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根本在于坚持“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使我们的学术话语充分彰显民族性和继承性,更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服务。

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话语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而我们所建构的中国学术话语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积极“走出去”,在国际学术界传播开来,能够引起广泛研究和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学术话语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信心和支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用中国学术话语和中国理论向世界清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为此,我们应在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加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和提炼标识性概念的能力,整合多种资源建构中国理论,以新技术新手段促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

在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开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同时,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学术话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传播,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构件是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不仅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展开的直接环节,而且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实践内涵。关注理论范畴的实践内涵,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贯彻《意见》精神,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崇高使命和紧迫责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实现了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革命,直接体现为理论范畴的创新。

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走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哲学话语体系,批判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仅举一例来说,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探索中,“市民社会”构成了他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哲学的核心理论范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国家”“私有财产”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但这一批判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特别是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才获得了科学的基础。相应的,“市民社会”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也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正如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的“道路回顾”中所提到的那样,“市民社会”是黑格尔用来表述“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术语。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市民社会”在广义上就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在狭义上则特指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范畴的这一变化背后,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创新,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的拓展和深化。

在剩余价值制定的过程中,存在困扰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性理论难题。这就是如何将这样一种科学的发现,以不同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方式,科学地叙述出来。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诸范畴,虽然在表现中呈现出经验实证色彩,但就其本质来说却是对现实存在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甚至以一种想象的方式掩盖了这一抽象的社会历史起源。在追溯这一起源并将科学叙述出来的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借助于理论中介的辩证运动实现了本质与现象、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当然,“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披荆斩棘,数易其稿,修正甚至是在放弃了曾经提出和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其中,“资本一般”的出现和消失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正如恩格斯在肯定马克思对《资本论》叙述方法的探索时所提到的那样,“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资本论》在话语体系上的科学性根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辩证运动。剩余价值理论或价值形式理论之所以科学,并不仅仅在于它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现象,或是形成了自洽的逻辑体系,而恰恰在于它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叙

关注理论范畴实践内涵

◎周嘉昕

创新学术话语体系

述出来,并以范畴的关联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畴的实践内涵,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创新的全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不仅是一个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具体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将实践经验理论化,并上升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实践方案和理论贡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理论范畴的实践内涵获得凸显并不断丰富,反过来也推动了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繁荣和发展。以“实践”和“矛盾”这两个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为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革命斗争的现实,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消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对上述两个概念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斯大林教科书体系中仅仅将“实践”作为认识论一个环节的观点不同,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思想深刻地反映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中。毛泽东关于矛盾规律的阐发,深刻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现实,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已经成为今天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具体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上来说,关注理论范畴的实践内涵,致力于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在投身这一光荣事业的过程中,存在值得重视的三个问题。

第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在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强调理论本身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这就要自觉反思两种可能存在的错误倾向:一是过分关注理论自身的发展,而忽视对理论范畴的实践内涵的探索,“两耳不闻窗外事”,“回到故纸堆”。二是片面强调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盲目跟风,缺乏理论定力。需知理论和实践之间往往并非直接合二为一,科学研究必须关注二者的中介环节,特别是概念范畴自身理论意义和实践内涵的辩证统一。

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作为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逻辑延伸,在学术研究中保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是开展理论创新、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重要内容。简言之,坚持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我们不仅要探索、思考、解决实践提出的真问题,同时也要将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放进科学理论中审慎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反思自身理论方法和逻辑框架,创新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信。学术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和体现。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同国际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对话,而且在问题、理论、方法和话语上已经具备了引领国际学术前沿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扎根中国实践,聚焦中国理论,凝练中国话语,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出更为响亮的中国声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